

戴 震

一十八世紀中國唯物主义哲学家

周輔成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睡”字结构十分复杂，要直截了当。

戴震

翻墨戏：“腹中自有千军胆”、“腹中全挂”正合

——十八世紀中國唯物主义哲学家——

平主文慈恩西蜀羅丁臨食賦詩采書本。自

用 鋪 成 茅

周輔成

目 錄

一	一个实事求是的性格的形成与發展.....	1
二	戴震哲学思想的來源.....	11
三	戴震的自然觀——天道只是“气化流行”.....	17
四	戴震的認識論——离客觀的“物”談“理”，必只 是主觀的“意見”.....	41
五	戴震的社会道德論——“必然”与“自然”合一， “理”与“欲”合一.....	53
六	結束語.....	71
	附錄：研究戴震思想的參考資料.....	77
后	記.....	82

一 一个实事求是的性 格的形成与發展

戴震是中國哲学史上具有最鮮明的唯物主义色彩的啓蒙思想家，也是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战士之一。

他是在1724年（雍正元年）生于安徽省徽州府休寧縣。字慎修，又字东原。他的父親靠族人帮助，經常在江西南丰縣作小布商[●]。家境極苦。他在十八歲时，曾随父親到南丰，靠教幼童維持自己的生活。二十歲时回休寧家，刻苦讀書。二十二歲即开始著作，以后几乎每年成書一、二种。三十歲时，因为生活困难，曾至友人汪梧鳳家教幼童。三十三歲避難去北京，寄居徽州會館，常常三餐不飽。但却結識了京中一些進步人士。很多人知道他对科学及經学、文字学有研究，都來訪談。当时，他大半仍靠教授幼童維持生活。以后为生活与學問，往來于北京、揚州、山西之間。屢次會試，都因他

● “明末流寇之乱，徽地以僻处山中，独獲完善，休養生息，至乾隆朝，故徽屬最称殷富。維时族之人多务商業，以豪侈相尚，虽未知为學之道，而故家大戶藏書頗富。公父为族人經營布業于江西之南丰。家素寒，無力購置之本，多向族人假借。”（“軼事”，引自魏建功：“戴东原年譜”）

的思想和統治者要求不合，未得考中[●]。他五十一歲時曾在浙江金華書院作主講。當年北京開設四庫館，戴震以特召赴京充纂修官。在館中工作了四年。他是在急于想脫離四庫館回鄉的情況下，在北京死去。

戴震是一位實事求是的學者。他的學問與性格，是當時社會的進步方面的反映。他的小環境休寧縣，雖然山多平原少，但因為出產茶葉及其他關係，人民多向外發展，所以對於大城市的文化，吸收很快。當時茶葉是出口貨，常與外國人發生直接或間接關係，因此易與國外文化接近。

據記載，戴震十歲時讀書，就能過目成誦，並能提出獨到見解。有一次，老師教完“大學章句”的“右經一章”，他便問：

“何以知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道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這是朱熹的注解上所說的。”老師回答說。

“朱熹是什麼時候人？”他反問。

“宋朝人。”

“孔子、曾子是什麼時候人？”他又問。

“周朝人。”

“周朝與宋朝相隔有好多年？”

“挨近二千年。”

● 他的學生段玉裁所作“戴東原年譜”，特別標出六次“會試不第”。其意在表示當時考試制的不公道，也揭露當時統治思想對於異己思想的殘酷壓迫。

“既然相隔二千年，朱熹如何能知道是如此？”[●]

戴震就在这么年幼的时候，已经有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讀詩經的时候，讀到“秦風”的“小戎篇”，便立刻繪出圖來，使觀者驚奇其了解的詳实。那时，他只能在書本上用功夫，所以总是在文字上力求切实。每一字都求了解透徹。弄得教他的一些老师都無法应付。后來老师只好直接向他講“許氏說文解字”。他学了三年，把所有節目都記憶和了解了，再又取“尔雅”、“方言”等書及各种注解，細細研究；对每一字，不僅根据六書，而且直接与群經貫通。因此，他不僅学会了文字学，并对十三經的注也弄熟了。

这时，他不过是年紀十六七歲的少年。他从这些切实的研究中，还悟見这一道理：即經書的最高原理是“道”，但“道”的表示必通过辞，辞又由字組成。这样，要了解經書，必先从最基本的“字”研究起，然后由“字”的正确了解到“辞”的正确了解，最后达到“道”的正确了解[●]。他認為宋代唯心主义者瞧不起訓詁学、瞧不起語言文字的研究，这是等于想过江而不要船、登高而不用階梯。

戴震从文字学还深入經学，使他的眼界更为廣闊。因此，

● 这故事，最早見于洪榜（初堂）所記“戴先生行狀”。以后段玉裁所著“戴东原年譜”，以及王昶所撰“戴先生墓志銘”、江藩作“國朝漢学师承記”，均記載这故事。

●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段玉裁：“戴东原年譜”；戴震：“古經解詁沈序”，“与是仲明論学書”。）

他把文字和制度名物放在一起，認為這是通“辭”、通“道”的關鍵[●]。他雖然未進一步認識到字義和制度名物均可作為客觀的社會現象來研究，但也能見出二者的關係。這不僅使字義本身的研究變為客觀的，而且他深信經中之“道”，也必寄於客觀的社會政治制度。這使實事求是的思想，又推進一步。

從此，戴震的實事求是的方法，首先應用於文字學和經學範圍內。我們在這裡必須注意的，是戴震自始即僅以研究字義為出發點，並非是最后目的。他的最后目的，本是在“聞道”。早年，他也許在“聞道”方面用的功夫較少，但以後戴震思想的發展中，“聞道”的地位却逐漸變得更重要。所以他的主張，並不能為許多拘拘小儒——只知在文字圈內打轉的人——作掩飾。

戴震雖然在文字學、經學上做了一番切實功夫，但他的切實方法，還不止於在這個小範圍內。他後來又推廣經學及於自然科學、工學；推廣古學及於西洋學問。他在二十歲時，曾根據西人的龍尾車法作“贏旋車記”，又根據西洋的引重法作“自轉車記”。

他在这种孜孜不息的研究工作中，忽然遇見了大學者江永（慎修）。那時江永已過六十歲，不僅以經學——特別是三禮——聞名于世，而且在數學、天文、音韻、地理各方面

● “先生丁酉正月與玉裁書曰：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段玉裁：“年譜”）

很有成績。也是一位實事求是的學者。戴震一見江永，便傾心崇拜，立即把自己著作請求江永教正。不論江永和戴震是朋友關係或師生關係，無疑地戴震是深受江永思想的影響的[●]。他不僅自己去請教，而且还約集了同郡友人汪肇龍、鄭用牧、金榜、程瑤田、方矩等去請教。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學派。戴震的實事求是的性格，也在这條件下成熟了。

尽管这一时期，戴震的物質生活是異常困苦，但並沒有挫折他的研究精神。他曾經替朋友汪梧鳳教幼童，以求一飽；曾經“家中乏食”；曾經為了逃避本鄉惡霸，孑然一身逃至北京，結果，連每日粥食都不能維持。後來，好容易在王宅教幼童過生活。但是，就在這些時候，我們的實事求是的學者戴震，不僅教出一位幼童王念孫成為清代大漢學家，不僅有很多大學者如段玉裁等來拜門求學，而且还著成了很多有價值的科學著作。我們試把他在这十二三年間著成的書列為下表：

“籌算”，一卷，二十二歲時作；

“六書論”，三卷，二十三歲時作；

-
- “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于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學淹貫，巋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學就質正焉。江先生見其盛年博學，相得甚歡。一日舉歷算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所疑，十余年未能決。’先生請其書，諦觀之，因為剖析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驚喜，嘆曰：‘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真江先生之學周詳精整。’”（洪榜：“戴先生行狀”）

“考工記圖注”，二卷，二十四歲時作；

“轉語”，二十章，二十五歲時作；

“爾雅文字考”，十卷，二十七歲時作；

“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三十歲時作；

“詩補傳”，三十一歲時作；

“勾股割圓記”，三卷，三十三歲時作；

“金山志”，三十五歲時作。

他在这时期的基本思想，可以从他当时給朋友們的信中得以知道。他虽然仍主張“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但着重点，已放在“道”上。他說：“有一字非其的解，則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他并責备只知注重文字文章而不講“道”或义理的人。他說，君子惟以聞道为务，那些只善于文章考核的人，都未尝有志于聞道；这种人，即使講“道”，也必穿鑿附会，先入为主，積非成是而不自知。戴震在此最大的發見是：凡在这問題上有錯誤的人，必定会以私見为古人之見。其弊病，与講“道”或义理而不知重文字的人所犯的錯，是一样的。在戴震的意思，文字与义理，不能孤立而論，二者必須結合。他更認清楚当时在政治上犯錯的人，也反映在文字和义理的誤解上。他以为宋代以來學者及政治家，明明是自己私見，偏說成是古聖賢的意思。其方法是：不管古人語言文字如何，只要抓着一二可附会的

● “与某書”（“戴东原集”（下簡稱“文集”），卷九）。

字句，便附会下去，結果，一处事，便把自己主观所决定的“理”，自以为合于古人文理，强断实行，对于事情原委隱曲，絲毫不管。結果便造成天下大乱。戴震在这里，就从學術上的实事求是，一轉而为在政治上实事求是。他很痛心地攻击当时政治是动辄以“理”殺人。他为真理呼冤，也为一切政治上的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呼冤！戴震就在这种呼冤声中，使他的思想接近了人民，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呼声。

戴震即于此时在揚州得識經学大师惠棟（定字）。他佩服惠棟講經的方法，認為惠棟是他的知己。他后来做了一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順着惠棟的意思，把“故訓”与“理义”視為不可分离，認為研究“故訓”，就在于弄清古代典章制度。而古代的“理义”，也存于典章制度內。这是最实在的根据。

戴震虽然一方面叫人“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貫”^①，似在故紙堆中打轉，但是，一方面也知“株守旧聞而不复能造新意”的毛病^②。所以，在他看来，求“古”与求“是”是合一的，故訓与理义是合一的，信古与創造也是合一的。他不但重視考核，也重視义理的發見。从这时起，繼承惠棟，开始注意“礼記”，由“礼記”而知“詩”、“書”、“易”、“礼”、“春秋”、“論語”、“孟子”皆是一貫。他称这七种書为“七經”。他想把其中一貫的道理，寫成“七經小記”。这計劃未完成。但是戴

① “与姚孝廉姬傳書”（“文集”，卷九）。

② “春秋究遺序”（“文集”，卷一〇）。

震在三十五歲以后的思想，顯然是以此为中心的。他后来曾参加四庫館，作了一些校勘考訂的工作，这只是应付場面的工作。他真正用心所在，还在于想完成“七經小記”。

可惜戴震死得太匆促。他只作成“原善”、“原象”二篇，“学礼篇”与“水地篇”也只完成一部分，其他二篇还未动手。幸好“原善”一篇先成，他的中心思想得到表现了。这时，戴震約是四十二歲。

戴震發展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至此，不能不有系統地和空談性理以及以理殺人的唯心主义者——当时的宋明理学信徒們——相斗争了。他在“原善”書中，指出空談性理的人，都是现实的黑暗政治的帮凶。他認為善与性，通乎客观世界，由天地之常与天地之德，可以見出善与性的根据。即是說，我們必須运用充分的理智去研究客观现实，然后可知善与性之所在。这种重視客观现实的精神，逐漸形成了一唯物主义的哲学系統。后来推進一步作成“緒言”，这書虽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証”的初稿，但是他的唯物世界觀，却在这本書內完全达到成熟，構成一个嚴密的系統了。

戴震从四十三歲左右就开始寫“緒言”，接着就改寫成“孟子字义疏証”，以后随时修改，直至五十五歲死前不久，才算完全改定。这是一部精心結構之作，虽然全書不过四万字左右，但每个字都經過千錘百煉，不愧是一本实事求是的哲学書。

戴震的科学精神，因为他認為必須从文字謹慎下手，每被人誤会为只重文字，或在講“道”、理时只局限于文字界說

之中。有些人，讀了戴震的哲學書，見其中多是一些“某者某也”的定義辭句，遂以為戴震的功績不過是把歷來哲學上概念弄清楚明白而已。這是大錯。戴震後期精神，遠超出這種局限。他的書，是想使“古賢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得理”這一意思得到充分實現，所以他把注重點放在“情”、“欲”、“理”三者關係上，要使一切講“理”的人——特別是統治階級，要設身處地為人民的情欲或實情着想。人民的情欲是客觀的，因此，理也是客觀的。戴震是從這種主張建立他的唯物主義哲學，所以他的唯物主義哲學，不但是實事求是，而且充滿了戰鬥精神。無怪他臨死前致段玉裁信上說：“僕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戴震一面很痛恨當時統治者，一面又在四庫館內替統治者工作，他的內心是苦痛的。無怪他時時想辭職回鄉休息[●]。正當要起行時，足病阻止了他。他以為足病是可以好的，不料由足病引起其他病，就死在北京了。

臨死一刻，只留下這樣幾句話：“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這正是他和當時佛學大師唯心主義者彭允初論辯後不久時候。他所謂義理之學，就

● “丁酉四月作札與玉裁云：僕足疾已逾一載，不能出戶。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實不復出也”；“丁酉五月二十一日作書與玉裁云：……歸山之志早定，八月准南旋。”（段玉裁：“年譜”）

● 王陽甫“未定稿”，引戴衍善所述。又見于焦循（里堂）著“雕菰樓集”“申戴篇”。

是他生平坚持的唯物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拿这种精神來养心，無怪他能一生坚持真理，并頑强地和唯心主义斗争。他以这种义理來养心的时候，心是乐观的，勇敢的，生气勃勃的。这种从唯物主义养育成的精神，永远不朽！

二 戴震哲学思想的来源

戴震在生活上逐渐形成一实事求是的性格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这种性格和思想，如果细细追究其来源，可知和当时社会大环境是密切联系的。

戴震生活的年代，是1724年（雍正元年）到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这时期社会，对于戴震的生活与思想发生影响的，有三点：

第一点是：当时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萌芽。本来，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在明代已经开始萌芽，但是，由于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争，使整个国民经济都遭受破坏，当然连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也遭破坏了。直到清朝统一了中国，费了几十年的经营和整顿，到戴震在世的雍正、乾隆时代，才可说好转了，恢复了明代极盛时期的经济繁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又显出了萌芽，特别是在出口货物如丝、茶、瓷器的出产区安徽、浙江、江西等省，最为明显。戴震生长在安徽茶业中心地休宁县，因此很容易地便和这个萌芽因素发生了关系。他的族人多是经商的^①。他自己

①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賈东西，行官于外，以就口食。”（戴震：“戴節妇家傳”）

在幼时随着父親和族人东奔西走。正由于此，他能深深了解一般市民階層的要求，也很能体会一般人民的痛苦[●]。这些体会与了解，当他寫文章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流露于文字中。他的整个思想，因此和資本主义生产因素密切結合着。

第二点是：当时政治，乃属于滿族大貴族地主集团的統治。这个集团的人数，对廣大人民來說，是極其微小，但正由于这个原因，他們为了維持自己統治，对人民曾用了各种威脅利誘的方法。在戴震生活的时期，清朝統治者正是实行高压政策取得胜利并躊躇滿志的时候，他們一面大屠殺民族革命战士，一面还利用了几百年來統治階級所利用的朱熹学說來宣布政令和罪狀。这种伪善的猙獰面孔，是清初王船山、顧炎武等所不曾見過、甚至想像过的。具体表现这几十年的高压政策是文字獄。在此受牺牲的民族战士真不知多少！而戴震却親眼看見。他不能不憤恨[●]。随便举几个最顯著的例。例如他看到雍正皇帝罵謝濟世、陸生柝毀謗程朱，更看到雍正皇帝为曾靜相信呂留良的“夷夏之防”的理論，竟至于把呂留良及其学生的尸，从墳墓中掘出來示众，又把这些死

● “震自幼为賈販，轉运千里，复具知民生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証’，專务平恕，为臣民訴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章太炎：“釋戴”）

● “戴震生雍正末，見其詔令謫人，不以法律，顧頗取雜閩儒言以相稽，覘司隱微，罪及燕語。九服非不寬也，而遇之叢棘，令士民搖手觸禁，其量傳深。”（同上）

人的族人、學生等或殺或降為奴[●]。這些事實，不能不令戴震對程朱的唯心主義起反感。在這種嚴威下，最初，他只隱晦地說程朱學說有缺點（見所著“原善”與“緒言”），但愈後則戰鬥意志愈強，到了著“孟子字義疏證”時，他對朱熹的唯心主義哲學便加以根本否認，視之為與佛教、道教，與陸象

- 雍正朝時，有謝濟世注解“大學”，從“禮記”本，而不從朱子“四書集注”本，不參用程子所補“格致傳”。結果竟被順承郡王錫保奏告謝濟世毀謗程朱。雍正皇帝親自批諭為“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見故宮博物院出版“清代文字獄檔”）。大臣們竟議罪該斬首。

其次，陸生柝作“通鑑論”，亦為錫保檢舉。手持程朱思想為凶器的雍正皇帝親自分為八項，逐項批駁後，竟說：“罪大惡極，情無可道，將陸生柝軍前正法，以為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

再次，1733年，由於曾靜相信呂留良的“夷夏之防”，主張民族主義，勸總督岳鍾琪起義，雍正皇帝竟殘酷至於把呂留良父子的尸和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逵的尸，從墳墓中掘出來“戮尸暴示”，并把他們的子孫、再傳學生，或殺、或降為奴隸。

雍正皇帝又親自根據程朱思想著“大義覺迷錄”、“朋黨論”，要當時大小官員都要讀。中國歷史上統治階級對於思想的控制和壓迫，恐怕再也沒有比這時更殘酷黑暗的了。以上所舉，不過是隨便提到的例子。實際上在雍正皇帝統治十三年中，死于文字獄的進步人士，真不知多少！

雍正皇帝死后，到了繼承的乾隆的時代，對於思想統制更嚴。曾靜因為作了一篇“歸仁記”，向統治階級投降，曾得雍正皇帝嘉許，并特別告示大眾“曾靜系朕特赦之人，……即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誣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但乾隆皇帝就在即位後數月，便將曾靜慘殺，用以威吓人民。以後文字獄，并不減于雍正時代。直至乾隆四十六年，一位名叫尹嘉銓的書生，竟被加以“不以朋黨為非，又襲講學家自重之習，學孟子為王者師之說”的罪名，被處斬死。乾隆皇帝心中的思想，依然是雍正皇帝心中的思想。

我們舉出上面這些例，所在時間，正是戴震從初生以至死的時間。戴震在這樣一種劇烈的思想鬥爭時代，他的環境的惡劣，可想而知。他的鬥爭，如果稍一不慎，便會慘遭不幸，不僅自己生命不可保全，就是親戚、朋友、學生的生命也不可保全。

山、王陽明的哲學，無有分別。并明白地強調指出這種哲學和統治階級壓迫人民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

第三點是：當時科學知識的發達。由於明末清初西方科學知識輸入的刺激，這時中國人已經知道了、并且發展了關於天文、數學、地理、生理，以至農田水利、工藝各方面的知識。從1605年利馬竇、徐光啓等刊行“乾坤體義”及“幾何原本”起，經過1674年南懷仁等刊行“坤輿全圖”，以至1752年戴進賢刊行“黃道總星圖”，總計一百五十年間，幾乎每年都有一二種著作或譯述的科學書籍出版。這些書，在初出版時也許影響還不大，但逐漸流傳至社會各處，便產生極大的影響。戴震恰遇着這個潮流，很快便接受了這些思想。他居然在二十歲時便會“因西人龍尾車法作‘贏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轉車記’”；二十二歲就作“籌算”，整理中國古代九章算術，以後又作成天文、曆算、地理、工程、水利著作數十種。這些，都是在西洋科學知識的影響下作成的。那時西洋科學知識，也并不像今日這般有系統，但戴震整理中國語言學和經學，却是盡量採用了這種科學方法的。他研究哲學，

- 戴震所反對的宋明唯心主義，基本上是指清代的統治階級思想家所了解的程朱哲學。在戴震以前，民族戰士呂留良也相信程朱哲學。呂留良因此顯出軟弱性，但呂留良的進步思想，決非是戴震所反對的對象。我們可決然地、具體地說：戴震心中所反對程朱信徒，乃指雍正、乾隆皇帝，以及李光地、張伯行等類人。這些人，是人民的敵人，無耻的學痞。但我們這樣說的時候，也並不是說宋明唯心主義，其哲學是積極的。須知，正因為他們是唯心論，有缺點，所以掩蓋了他們在其他社會問題、民族問題上的進步見解。而後代統治者，亦正因為這樣，才利用程朱等人哲學。戴震亦因此不得不集中火力攻擊宋明唯心哲學。